

# 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小河西文化”再认识

李腾达<sup>1</sup> 陈伟驹<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敖汉旗榆树山与西梁遗址自发掘伊始即被认定为小河西文化遗址, 其最主要的判断依据在于所复原的出土器物中包含3件夹砂素面筒形罐, 这种器物被视为小河西文化的典型遗物。由于这两处遗址的出土遗物尤其是可复原陶器标本相对较少, 缺乏确定遗存性质的典型器物组合, 从而直接影响了学界对于遗址性质的判断。本文在全面梳理这两处遗址发表的出土遗存情况和聚落形态并参考遗址的绝对年代后, 发现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均与可明确判定属小河西文化的其他遗址有着较大差异, 且与赵宝沟文化更为接近, 同时不排除包含少量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的可能。

**关键词** 榆树山及西梁遗址; 小河西文化; 赵宝沟文化; 文化性质

## 1 前言

榆树山与西梁遗址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孟克河右岸, 自发掘伊始, 这两个遗址便被认定为小河西文化遗址<sup>[1]</sup>。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出土的复原器物中包含3件夹砂素面筒形罐, 这种器物被视为小河西文化的典型遗物。在后续研究中, 学界普遍沿用了这一观点<sup>[2-5]</sup>。由于小河西文化的性质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小河西文化”, 而此类素面筒形罐遗存应属于兴隆洼文化最早的一期遗存<sup>[6]</sup>; 亦有学者在将“小河西类型”视为兴隆洼文化分支的基础上, 将其分为早晚两段, 其中晚期阶段遗存就以本文所讨论的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为代表<sup>[7]</sup>。然而, 若全面梳理这两处遗址发表的出土遗物, 尤其是除3件复原陶器外的陶片、石器和骨器, 以及遗址聚落形态的特征, 便会发现遗存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并不符合现有典型小河西文化的内涵。因此, 有必要对这两处遗址的文化性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 2 从出土遗物看榆树山、西梁遗址的文化性质

榆树山遗址共发掘了10座房址和4座墓葬, 在发掘结束后又对该遗址房址的整体分布

收稿日期: 2025-06-07; 接受日期: 2025-12-30

作者简介: 李腾达,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Email: litengda@ucass.edu.cn

\*通信作者: 陈伟驹, 副教授, 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Email: chenwj289@mail.sysu.edu.cn

情况进行了调查,近50座房址大致成排分布,共10余排;西梁遗址共发掘了15座房址和1座墓葬,从调查及发掘情况来看,房址总数为80余座<sup>[8]</sup>。与此同时,榆树山与西梁遗址还出土了一批涵盖陶器、石器、骨器等多种类型的遗物。

## 2.1 陶器

现有发掘资料显示,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陶器中可复原或可观察出大体形态的器物较少,仅有3件夹砂素面筒形罐,即榆树山遗址F8②:6、F14②:6和西梁遗址F110④:18<sup>[9]</sup>。这3件陶器便是发掘者及后续研究者判断这两处遗址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素面筒形罐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发现,对此类陶器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不能不仔细辨别。从陶器形制上看,这3件筒形罐皆属夹粗砂陶,陶质坚硬,胎体偏厚,陶色多为灰褐色。由于烧制火候不均,器壁内外颜色不匀,其中榆树山遗址F14②:6器壁上部为红褐色,局部呈褐色斑块,内壁呈灰褐色。3件器物均无纹饰,属素面陶。从器型方面观察,榆树山遗址F8②:6为圆唇,口部微向内敛,斜直腹略向外弧,平底,底部较厚,口沿下部有2个竖向排布的单面钻的孔;西梁遗址F110④:18为方唇,敞口,斜弧壁,平底,底部较厚且略向内凹;榆树山遗址F14②:6仅残存筒形罐腹部及罐底,胎体相对于另外两件器物较薄,内外壁皆呈红褐色,外壁有纵向涂抹的痕迹(图1)。

对比小河西文化其他遗址中发现的同类器物,榆树山与西梁遗址出土的筒形罐特征有别于可明确判定属小河西文化的白音长汗遗址一期遗存的筒形罐。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素面筒形罐多为斜弧壁,器壁和器底相对较厚且微向内凹,整体形制相对较为瘦高;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胎体则相对较薄,同样以素面为主,纹饰只见附加堆纹一种,主要装饰于器物口沿处,包括长条形、圆圈形、波折形等<sup>[10]</sup>(图1)。如白音长汗遗址BT3②:9,敞口方唇,器壁微弧,底微内凹,夹砂陶,器表呈黄褐色,内壁呈黑褐色,口沿下残存三条竖向平行附加堆纹;BF64②:1,敞口方唇,斜直壁,平底,黑褐色夹砂陶,口沿下微向内凹,器表留有杂乱无序的细刷痕。此外,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的素面筒形罐由于烧制温度相对较高,陶质更为坚硬;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小河西文化素面筒形罐烧制温度极低,陶质极为疏松。两者虽同为素面夹砂陶筒形罐,但素面陶技术作为实用功能、审美取向与制陶工艺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只是制陶技术原始性的反映,也存在着出于功能性(制作简单)和审美观念考虑的可能性,不能仅以素面陶占比的多少作为年代早晚的判断标准。两者在烧制温度、制陶工艺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均体现在上文论述中的陶器器壁厚度、烧制程度、加工及修复痕迹等因素上。

有学者曾指出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的素面筒形罐在形制特征上与哈民忙哈遗址及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哈民忙哈遗址F49:16,方唇敞口,深腹斜直壁,平底,泥质灰褐陶,腹部有两排圆孔;F2:14,手制痕迹明显,圆唇敞口,

深腹斜壁，小平底，砂质夹蚌黄褐陶，器表有三对孔；F12:8，手制痕迹明显，圆唇敞口，两侧不甚对称，一侧为弧壁，一侧为斜直壁，平底，夹砂黄褐陶，器表可见两个孔。尤其是榆树山遗址F14②:6器表的纵向刮抹痕迹，风格更似哈民忙哈遗址的素面筒形罐（图1），因此推测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文化遗存很有可能归属于哈民忙哈文化<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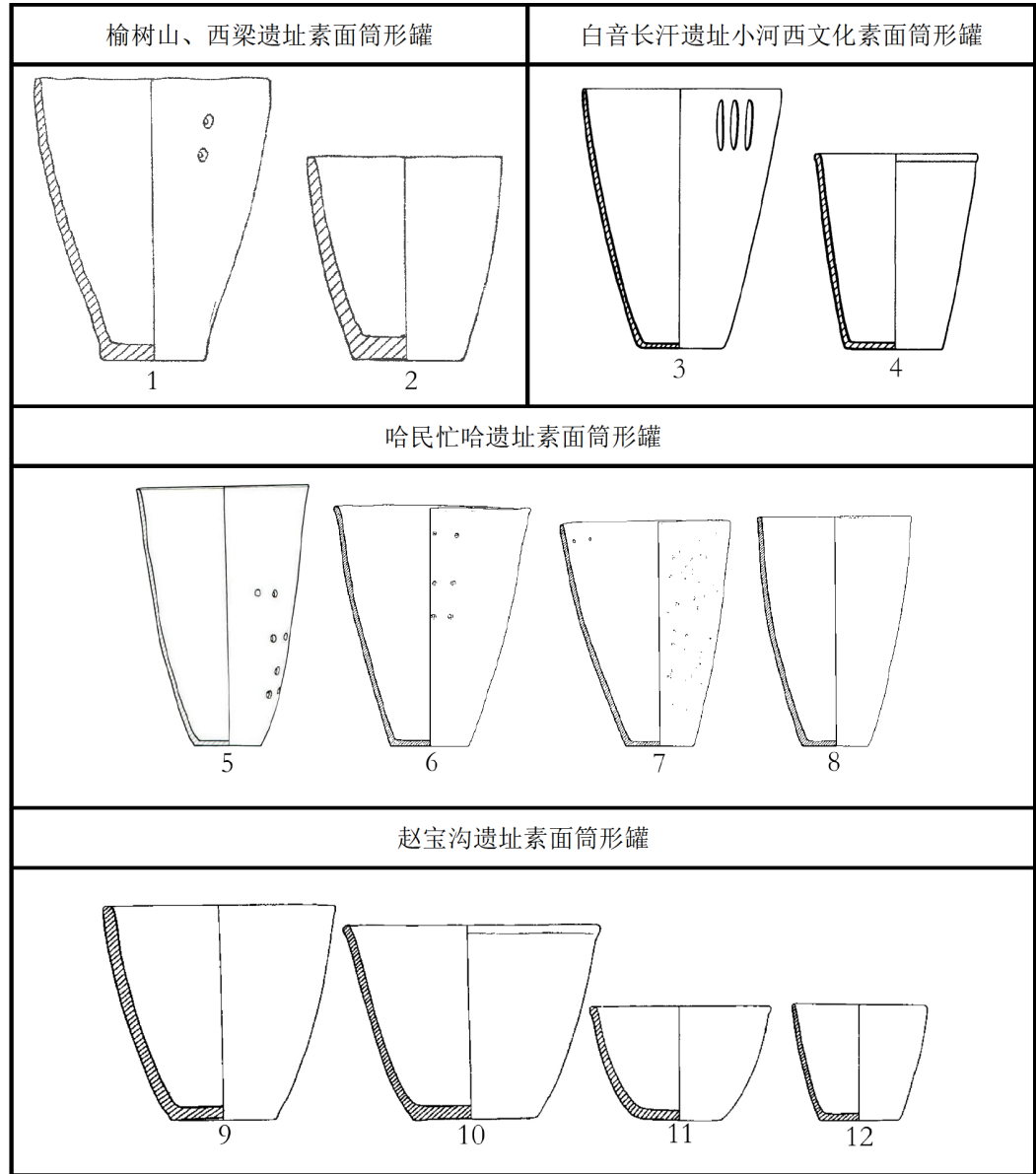


图1 榆树山、西梁遗址与小河西、赵宝沟和哈民忙哈文化筒形罐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the tube-shaped pots of Yushushan and Xiliang sites with those of Xiaohexi, Zhaobaogou and Haminmangha culture

1. 榆树山遗址 (F8②:6); 2. 西梁遗址 (F110④:18); 3、4. 白音长汗遗址 (BT3②:9、BF64②:1); 5—8. 哈民忙哈遗址 (F49:16、F2:14、F12:8、F2:16); 9—12.赵宝沟遗址 (F9③:114、F7①:35、F6③:8、F103①:8)

这种判断与“小河西文化”年代相距较远,可见仅从素面筒形罐判断文化性质得到的结论差异之大。为此,本文主张应该从全部遗物遗迹资料入手做综合判断。

首先,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的素面筒形罐与赵宝沟文化的同类器物在器物风格上也有相似性,尤其是弧腹、厚底的特点,与赵宝沟文化的相关陶器接近,如赵宝沟遗址F9③:114、F7①:35、F6③:8、F103①:8(图1)。其中F9③:114为手制,较为粗糙,圆唇敞口,斜直壁,一侧为弧壁,平底略内收,素面夹砂陶,器表呈黄褐色,内壁呈黑色;F7①:35,器表粗糙,圆唇敞口,斜直壁微弧,平底略内收,黄褐色素面夹砂陶;F103①:8,圆唇敞口,斜直腹,近直壁,平底,器表呈黄褐色,内壁呈黑色,素面夹砂陶。

其次,从陶器纹饰方面来看,在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的众多典型器物口沿及腹片中可观察到的纹饰主要包括压印短斜线纹、压印长窝点纹、菱形纹、刻划纹、弦纹加双菱纹和编织纹等,而在排除层位关系判断错误以及晚期遗存混入早期文化层的可能性后,研究发现此类纹饰从未出现于小河西文化其他遗址中。

对比报告中公布的陶片纹饰及纹饰拓片可以发现,发掘者在原报告中命名为菱形纹的纹饰,实际上包括几何压印纹及草划交叉纹两种类型,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可供观察的陶片大小有限,因此只能根据残存部分进行推测和对比。

其中,榆树山遗址F11④中发现的陶片包括一片陶器口沿,口沿处饰有短斜线纹,口部以下施有几何网格纹,而这一纹饰常见于赵宝沟文化陶器中,如赵宝沟遗址F2①:26;榆树山遗址IT⑥:1残片上所施草划交叉纹则常见于兴隆洼文化陶器中,如查海遗址F53:75。此外,发掘者在原报告中命名为编织纹和压印长窝点纹的纹饰类型也可于赵宝沟遗址和查海遗址出土陶器中发现类似纹饰(图2)。

在其他陶制品形制方面,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圆陶片,形制分为有孔与无孔两类,多采用夹砂陶的碎片改制成器,多经过磨制。其中,有孔圆陶片的外形多呈圆形或近圆形,中间有穿孔,皆为两面对钻制成,如榆树山遗址IK13①:1和F11①:40。发掘者就其使用功能推测此类器物可能为陶纺轮,而无钻孔的圆陶片系尚未加工完成的同类器物<sup>[7]</sup>。到目前为止,此类器物在小河西文化其他遗址中并未发现,但在同属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中则很常见,如赵宝沟遗址F9①:46和F9①:61(图3)。

此外,在榆树山遗址F9中还出土了一件陶泥塑人头像,器体呈灰褐色,系手工捏制,脸部狭长,两颊处稍宽,浓眉,双目圆瞪,阔嘴,高鼻梁,五官立体,表情生动。在赵宝沟文化的众多遗址中,曾多次发现房内出土陶塑人像的现象,如赵宝沟遗址F103①:5与F103①:6。这两件陶塑人像虽与榆树山F9中出土的同类器物在人物形态上有所差异,但制作风格十分接近,均为捏制而成,人物形态特征突出,五官立体,艺术水平较高。其中赵宝沟遗址F103①:6陶塑像脑后塑空,从后部残断情况来看,可能原属于某一器物的装饰部分(图3)。

在赵宝沟文化中,此类人物雕像往往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可能包含着原始先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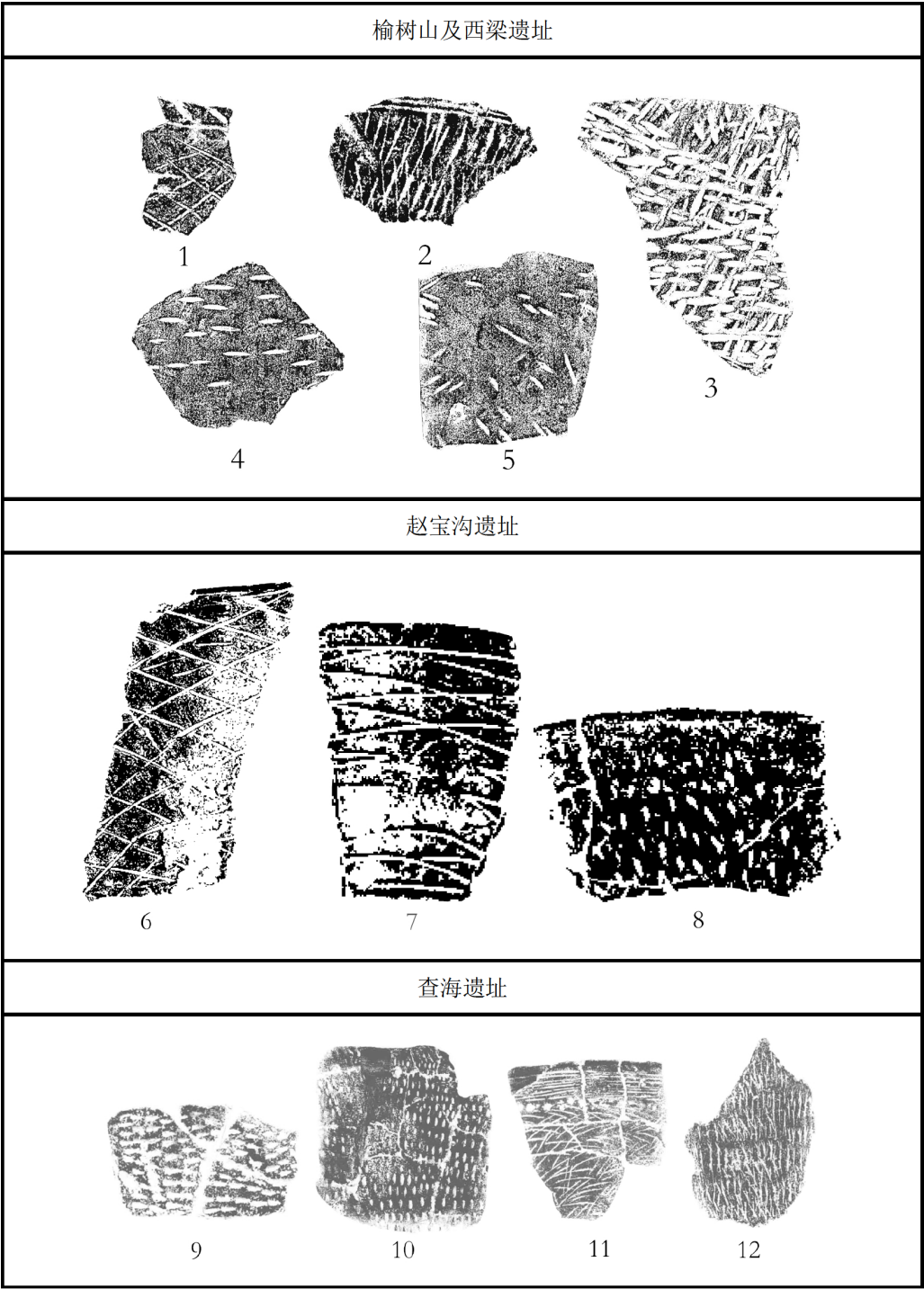


图2 榆树山、西梁遗址与赵宝沟、查海遗址陶器纹饰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pottery decorations between Yushushan, Xiliang sites and ZhaoBaogou, Chahai sites  
1、2、4、6. 榆树山遗址 (F11④采集陶片、IT⑥:1、F11④采集陶片); 3、5. 西梁遗址 (F102①:1、F101①采集陶片);  
6—8. 赵宝沟遗址 (F2①:26、F9①:58、F105②:8); 9—12. 查海遗址 (F4:44、F50:28、F32:37、F53: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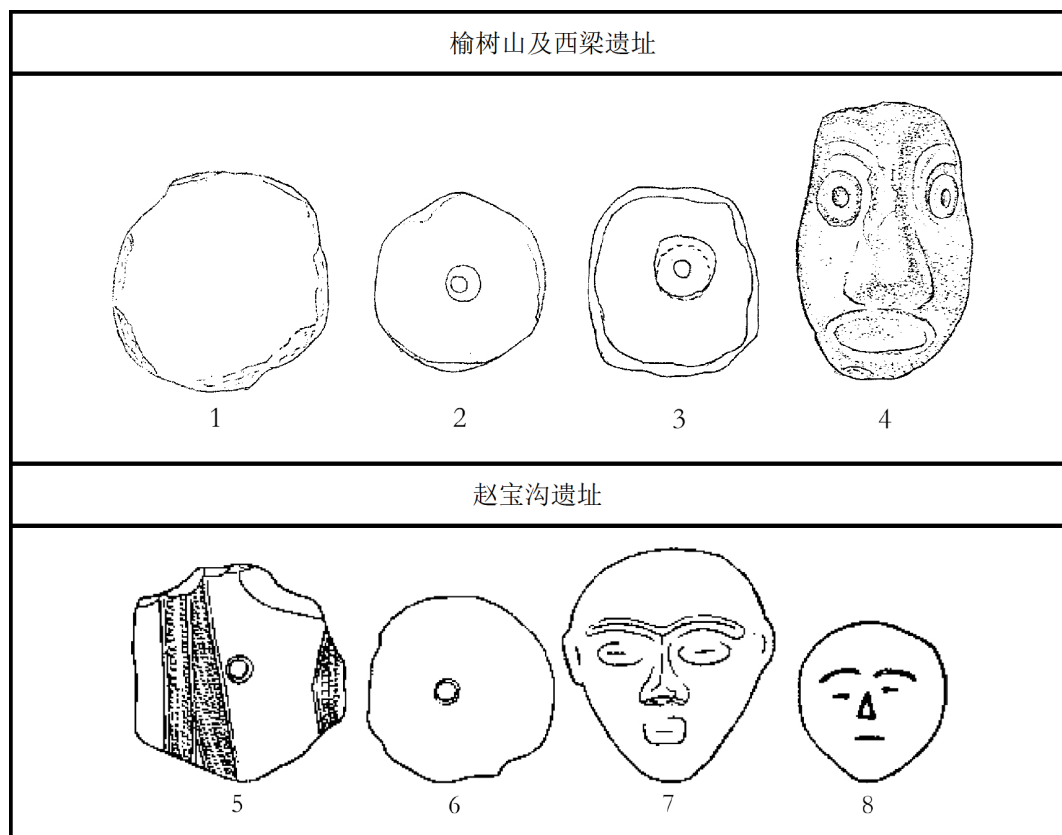


图3 榆树山、西梁遗址与赵宝沟遗址其他类型陶制品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other types of pottery products at Yushushan, Xiliang sites and Zhaobaogou site

1. 西梁遗址 (F101①:16); 2—4. 榆树山遗址 (I K13①:1、F11①:40、F9②:1); 5—8. 赵宝沟遗址 (F9①:61、F9①:46、F103①:6、F103①:5)

们对于祖先的崇拜或者更多尚未解读出的含义。李新伟曾提出重视仪式活动是赵宝沟文化时期的重要特征和文化传统，仪式活动在赵宝沟文化社会中往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以房址为单位的仪式活动最为普遍，房址成了礼仪活动的主要场所，这类仪式被称为“家户内的仪式”<sup>[12]</sup>。榆树山遗址的陶塑人头像也出自房址，与赵宝沟遗址出土背景类似，可能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内相似行为模式下的产物。

## 2.2 石器

在石器种类与形态方面，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中共出土石器标本196件，其中打制石器主要有砍砸器、盘状器、饼形器、石锄等，磨制石器主要有磨盘、磨棒、石杵、石臼、石斧、石镑、石凿、石刀等。还有部分形制特殊的石器，包括钻孔斧形器、有孔环形器、有槽石器等。小河西遗址共出土石器16件，白音长汗遗址小河西文化遗存中共包含3件石器。将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与以上可明确判断属小河西文化的其他遗存

相对比,可以发现两者间在石器种类及具体形态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首先,小河西遗址及白音长汗遗址小河西文化遗存中均未发现镞、凿、刀等类型的石器,而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中除上述器物外,还发现了较多数量的石斧,整体石器种类相较于其他小河西文化典型遗址更为丰富。

其次,在观察不同遗址中出土大型石质工具的形态后可以发现,小河西遗址中出土的2件石锄与榆树山遗址中的同类器物虽均为打制而成,但仍存在一定的形制差异。榆树山遗址中出土的2件石锄在形态上有所区别。其中一件石锄F3①:16在形态上呈倒“丁”字形,上半部分凸出,为使用时安装木柄的部分,下半部分为打制的石刃,为直接使用的部分。此类石锄虽与小河西遗址中出土的石锄在形制上均呈倒“丁”字形,但在具体形态上仍存在较大差异。小河西遗址的石锄刃部较宽,柄部较短,且柄部与刃部连接处呈明显的亚腰形,而榆树山遗址的石锄则柄部较长,刃部较窄。另一件石锄T6②:1柄部较长,刃部较窄,整体形态狭长,类似圭形,刃部前端有明显的破损,一侧打磨圆滑,另一侧可能尚未加工完成(图4)。榆树山遗址的发掘者曾指出这件石锄与兴隆洼地面采集的Da型锄相似<sup>[7]</sup>。

最后,反观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石器本身,在器物种类及具体形态方面与赵宝沟文化各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均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如赵宝沟遗址中的有槽磨石磨制光滑,中部有一凹槽,发掘者推测其可能用作加工某种精细器物,后有学者推测其为箭杆整直器<sup>[13]</sup>,而在榆树山遗址中也存在形态特征高度相似的同类器物。

除此之外,在饼形器、钻孔石器等类型的石器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图4)。虽然石质工具的形态主要由其功能而非审美观念决定,加之石制品更为耐用,因此相较于陶器,石质工具的形态变化速率更为缓慢,形制相对固定,但榆树山与西梁遗址出土的石器不论是从器物种类上还是具体形态上都与典型的小河西文化遗存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众多遗址中地域类型的差异或遗存保存、发掘情况的偶然性,因此重新审视榆树山与西梁遗址的文化性质有一定的必要性。

### 2.3 其他类型遗物

上述陶器、石器形态特征方面的差异说明榆树山、西梁遗址在文化归属上可能并不属于小河西文化,而是与赵宝沟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在其他类型出土器物的种类及形态方面同样可以看出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在文化性质的判定上存在可商榷之处。

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骨器,共计170余件,其中以鱼镖与骨锥为大宗。此外,还有角器、蚌器、牙器等工具。而在可明确判定属小河西文化的小河西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小河西文化遗存中则尚未发现骨器。反观赵宝沟文化出土了大量以动物长肢骨和兽角为原料,经磨制而成的骨角器,主要类型包括带槽骨锥、骨锥、角锥、骨针、鱼镖及各种制陶工具等。此外,有学者指出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骨器中鱼镖及复合石刃工具与兴隆洼文化中的同类器物更为相似<sup>[7]</sup>,也符合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中骨角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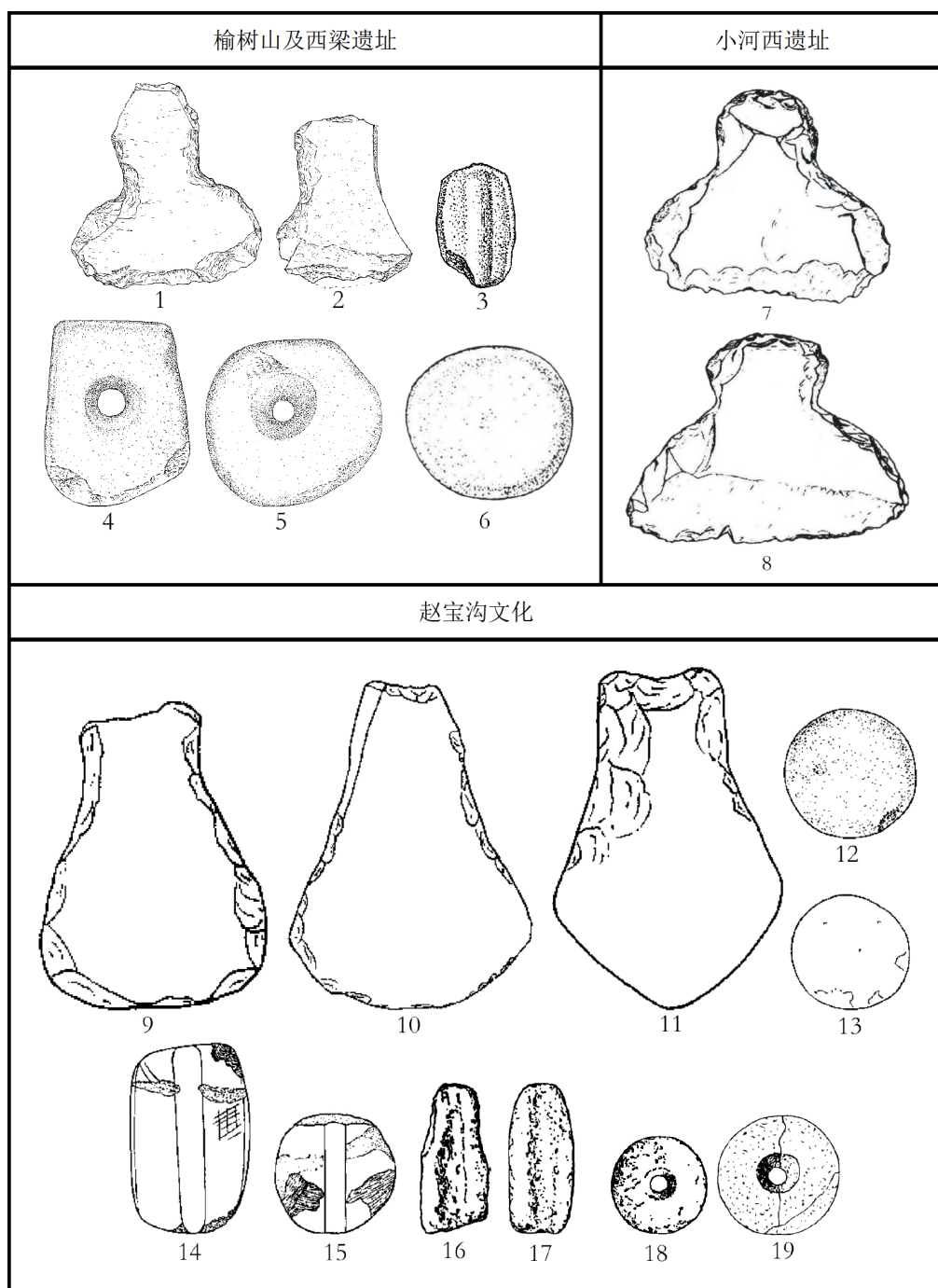


图4 榆树山、西梁遗址与小河西遗址、赵宝沟文化石器形态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stone tool morphologies between Yushushan site, Xiliang site and Xiaohexi site, Zhaojiagou culture

1—3、6. 榆树山遗址 (F3①:16、T6②:1、I采:50、T3①:1); 4、5. 西梁遗址 (F113②:2、F113③:12); 7、8. 小河西遗址 (F2②:2、F2②:3); 9—15. 赵宝沟遗址 (F2②:22、F9③:83、F7①:3、F103②:38、F104②:20、F9①:1、F9①:9); 16—18. 小山遗址 (F1②:19、F1②:31、F2②:12); 19. 水泉遗址 (F8②:3)

相对较多的情况。因此,我们推测除了赵宝沟文化,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同样可能包含部分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查海遗址的发掘者曾在报告中指出查海遗址早期、白音长汗遗址一期遗存、小河西遗址、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等以夹砂素面红陶筒形罐为主要陶器特征的遗存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文化面貌仍然相当复杂,不能轻易定性。其中,查海遗址早期、白音长汗遗址一期、小河西遗址遗存就查海遗址的材料而言,与后期的兴隆洼文化有着清晰的发展演变关系,因此可将这部分遗存看作查海—兴隆洼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在陶器中发现有小罐和杯等器型,陶器纹饰可见压印短斜线纹、网格纹、窝点纹,其器型和纹饰均较查海遗址早期、白音长汗遗址一期、小河西遗址遗存丰富,石器中造型规整的斧、锛和钻孔石器也为榆树山及西梁遗址所独有<sup>[14]</sup>。这说明当时已有学者对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文化性质产生了怀疑,认为其与典型的小河西文化遗存有所差异,但尚未展开详细论证。

### 3 从聚落形态看榆树山、西梁遗址的文化性质

在聚落形态方面,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均位于敖汉旗孟克河右岸,两者属于同一时期相互依存的两处遗址。两处遗址东西并列,被一片宽阔的平甸隔开,相距约500 m。榆树山遗址位于榆树山东坡中下部,共发掘了10座房址和4座墓葬,在发掘结束后又调查了该遗址房址的分布情况,房址成排分布,共10余排,近50座房址,遗址面积约4000 m<sup>2</sup> (图5)。

西梁遗址位于千斤营子村西梁坡地上,共发掘了15座房址和1座墓葬,从调查及发掘情况来看,房址总数为80余座,遗址总面积达到13700 m<sup>2</sup> (图6)。两处遗址在内部建筑及聚落布局等方面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房址大体成排分布,但排布不甚规整。榆树山与西梁遗址发掘的房址形制均为半地穴式,灶址位于室内中央位置,灶址平面形状主要分为圆形、椭圆形及瓢形三类。房址均未发现门道,部分房址在一侧或一角开辟一小窖,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为门道的前身,起着便于出入房址的作用<sup>[8]</sup>。室内外均发现有数量不一的浅坑,坑内发现有石器等工具。

从聚落规模及布局的角度观察与对比发现,对于明确认定属于小河西文化的各聚落,如小河西遗址、白音长汗遗址一期遗存、查海遗址一期遗存,其中小河西文化时期的房址数量往往不多,房址面积较小,聚落整体布局相对简单且房址分布相对分散。白音长汗遗址一期遗存分布面积约400 m<sup>2</sup>,其中共发掘了3座房址和2座窑穴 (图7);位于孟克河左岸的小河西遗址总体面积约615 m<sup>2</sup>,发掘者通过对地表分布的灰土圈观察发现遗址内分布着6排26座灰土圈,代表着26座房址,但在其实际发掘面积约300 m<sup>2</sup>的范围内仅发现并发掘了3座房址,因此剩余23座房址应分布在另外315 m<sup>2</sup>的范围内。对于这一情况,有学者指出要么代表着小河西遗址房址分布密度差距过大,要么说明对于小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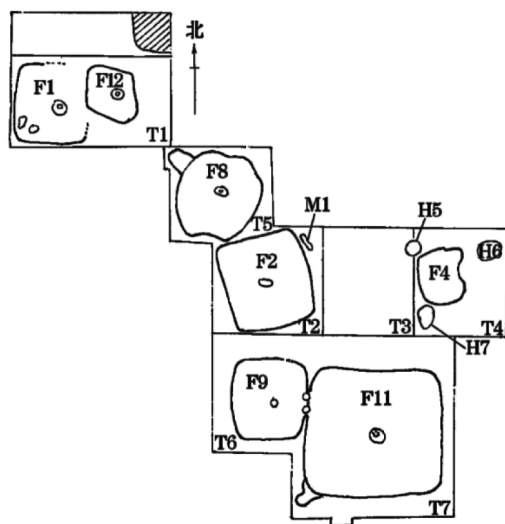


图5 榆树山遗址探方（局部）平面图<sup>[8]</sup>

Fig.5 Plan of the excavation square (partial) at the Yushushan site<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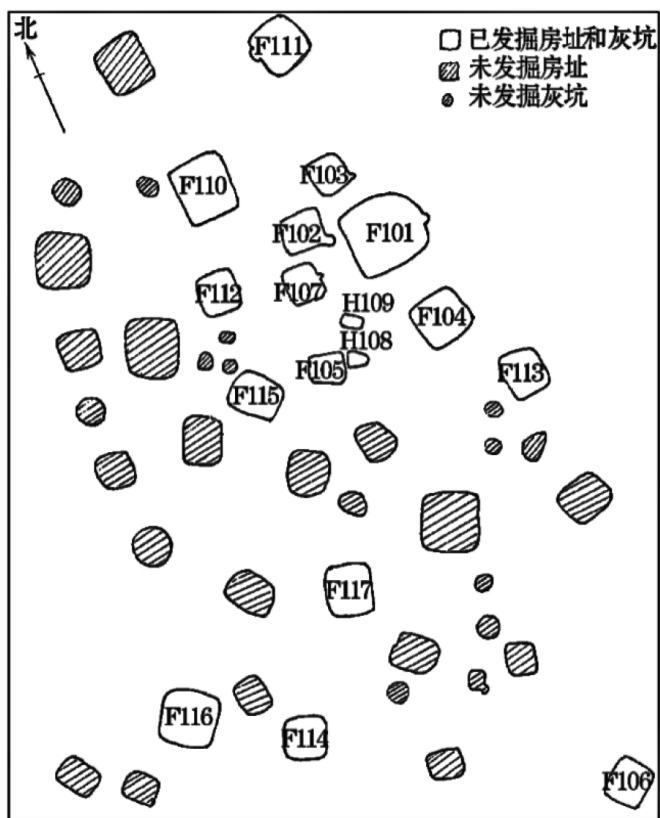


图6 西梁遗址房址分布示意图<sup>[8]</sup>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 sites at the Xiliang site<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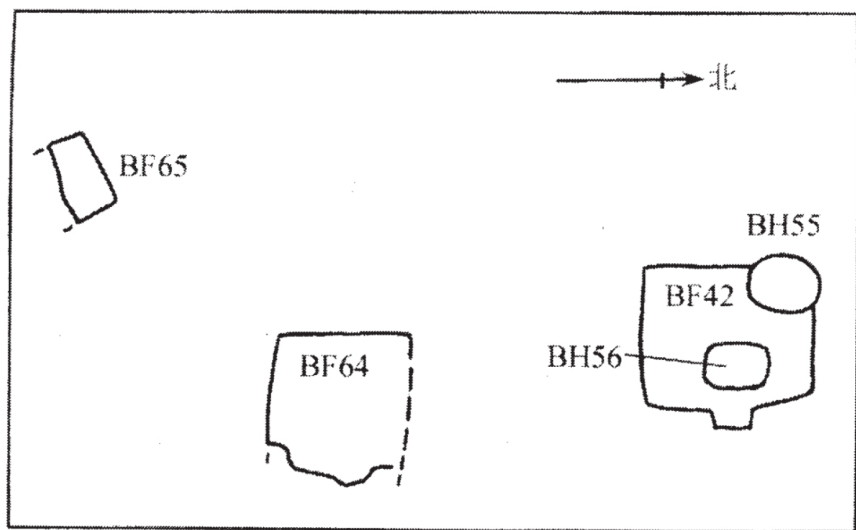


图7 白音长汗遗址小河西文化房址分布示意图<sup>[10]</sup>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house site distribution of the Xiaohexi culture at the Baiyinchanghan site<sup>[10]</sup>

遗址房址数量的判断还有待商榷<sup>[15]</sup>。相比之下,无论是房址整体数量还是分布密度,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均与小河西文化其他遗址有所差异,数量更多且分布更为密集,不同房址间更是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灰坑,这也是小河西文化其他聚落遗址中未曾发现的现象。

在房址等级划分及规模方面,发掘者依据房址面积将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房址分为了大、中、小三类,其中最小的房址面积为 $12\text{ m}^2$ ,中型房址的面积为 $28\text{—}39\text{ m}^2$ ,最大房址的面积为 $96\text{ m}^2$ 。这一情况或许表明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房址在聚落内部中的性质以及功能方面存在差异。反观小河西文化其他聚落遗址,在房址规模方面则并未发现明显的等级差异,房址面积也相对较小,每一间房址作为一处独立的生活生产单位,其性质也并未产生明显分化。但同样的情况在赵宝沟遗址中可以观察到,房址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且被发掘者分为了大、中、小三类,其中大型房址1座,面积近百平方米,中型房址的面积一般为 $30\text{—}80\text{ m}^2$ ,小型房址的面积一般小于 $30\text{ m}^2$ 。此外,无论是榆树山及西梁遗址还是赵宝沟遗址,其各个等级的房址中均发现有各种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且多包含灶、储藏坑等配套生活设施,这说明无论是大型房址还是小型房址,均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及生活单位。通过观察房址面积可以发现,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与赵宝沟遗址在由房址面积反映出来的基层单位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均有着较高的一致性,两者更有可能处于相近的历史发展阶段。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房址均未发现门道,部分房址在一侧或一角开辟一小窖,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为房址门道的前身。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多数房址内的小窖均位于房址内一角,而并非在房址一侧的中部位置,如榆树山遗址F11、西梁遗址F102。结合其房址内外的空间布局考虑,如房址内外是否设有储藏坑

等因素, 本文认为此类小窖的主要功能还是储藏物资, 同时作为出入口而存在。在赵宝沟遗址中曾发现一类凸字形房址, 如赵宝沟遗址F2、F6、F9等, 其特点是在房址东南壁或西南壁中部有一个向外凸出的部分, 发掘者指出这一凸出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个不规则的窖穴且房址的出入口可能也在这一位置<sup>[16]</sup>。

综上所述, 榆树山及西梁遗址无论是在出土器物相似程度还是聚落形态上, 均与可明确判定属小河西文化的其他遗址有着较大差异, 反而在文化面貌上更加倾向于赵宝沟文化。笔者推测, 这很可能是因为生活在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史前先民在废弃聚落时有意识地将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带走或进行处理, 遗址中未保留大量具有赵宝沟文化风格的遗存。因此, 本文建议将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文化性质归属于赵宝沟文化, 考虑到其中包含一部分兴隆洼文化的遗存, 推测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应该在兴隆洼文化晚期—赵宝沟文化时期。

## 4 榆树山、西梁遗址的年代问题

基于前文中对榆树山及西梁遗址文化性质的辨析, 可以重新审视这两处遗址的年代。

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共测得三个<sup>14</sup>C数据(表1)。

以往研究多将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归入小河西文化, 但近年新发现的材料与年代数据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认识。在此基础上, 有关这两处遗址的年代推论亦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首先, 对于这组年代偏晚的数据, 除了测年误差这一解释外,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小河西文化开始时间较早且其文化延续时间较长所致<sup>[2]</sup>。但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并未发现文化层堆积, 房址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叠压打破关系, 且各个房址中出土的器物风格也相对统一, 因此大概率可认定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为同一发展阶段的遗存, 延续时间不会过长。而关于榆树山遗址中两个测年数据的差异, 在排除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年代跨度大的情况下, 可能与兽骨测年样本所使用的“酸—碱—酸”预处理方式有关, 仅经过简单的“酸—碱—酸”预处理的骨骼可能会排除不了污染物质而导致测年结

表1 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sup>14</sup>C数据及其校正结果<sup>①</sup>

Tab. 1 The <sup>14</sup>C dating data and their calibration results of the Yushushan and Xiliang sites

| 遗址  | 单位    | 标本 | 实验室编号  | <sup>14</sup> C年代(5730)(距今) | 校正后年代(公元前) |
|-----|-------|----|--------|-----------------------------|------------|
| 榆树山 | F9②   | 木炭 | ZK2301 | 5325 ± 135                  | 4323—3656  |
| 榆树山 | F1①   | 兽骨 | ZK2302 | 5925 ± 120                  | 4894—4354  |
| 西梁  | F101① | 兽骨 | ZK2303 | 5435 ± 160                  | 4446—3714  |

① 所用放射性碳素半衰期为5730年, 所用树轮校正曲线为IntCal20, 校正程序为OxCal v4.4。

果偏晚<sup>[17]</sup>。

其次,通过层位学证据可以了解到,小河西文化与兴隆洼文化有着明确的相对早晚关系,即小河西文化早于兴隆洼文化。其中,小河西文化年代的确定主要依据明确属小河西文化的查海遗址早期遗存、贾家沟西遗址以及最新发表的西刘家屯遗址小河西文化遗存的测年数据。采自查海遗址F26的木炭标本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校正后年代在公元前5888—前5727年的范围内;采自贾家沟西遗址7个小河西文化样本的测年数据校正后均在公元前5900—前5700年的范围内;采自西刘家屯遗址不同堆积单位的15个动植物样品,经过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后,结果全部落在距今8000—7600年的范围内,其中11个样品的年代范围落在距今8000—7700年的范围内,4个样品落在距今7700—7600年的范围内<sup>[18]</sup>。综合上述数据,对于小河西文化绝对年代的判断最终落到了距今8000—7700年的范围内<sup>[19]</sup>。

由于榆树山及西梁遗址所测得的三个<sup>14</sup>C测年数据甚至在年代上已经晚至赵宝沟文化时期(公元前5500—前4500年),多数学者在判断小河西文化的绝对年代时弃用了这三个测年数据,选择通过对遗存形态的判断将榆树山与西梁遗址的性质判定为年代更早的小河西文化,从而弱化了这组<sup>14</sup>C测年数据的参考价值。

通过前文中对榆树山及西梁遗址出土器物、聚落形态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本文判断这两处遗址中的主体遗存属于赵宝沟文化,可能包含部分兴隆洼文化遗物。加之此前往往被弃用的榆树山及西梁遗址中的三个测年数据更是大致接近赵宝沟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从而进一步支持通过器物比较的结论,反映出其主体遗存的绝对年代主要集中于赵宝沟文化时期。

## 5 结语

综上所述,就目前已有的资料而言,本文推测榆树山及西梁遗址的性质并非先前学界普遍认定的小河西文化遗存。通过前文中的文化因素对比分析,可以了解到榆树山及西梁遗址无论是在出土器物相似程度还是聚落形态上,均与可明确判定属小河西文化的其他遗址有着较大差异,反倒与空间分布范围一致的赵宝沟文化更为接近,同时不排除包含少量兴隆洼文化器物。碳十四测年数据也进一步支持这种判断。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G]//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131-132.
- [2] 索秀芬. 小河西文化初论[J]. 考古与文物, 2005(1): 23-26.
- [3] 赵宾福, 杜战伟, 薛振华. 小河西文化检视[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4(1): 17-25.
- [4] 乌兰. 西辽河地区小河西文化聚落的微观分析[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5(3): 1-5.
- [5] 于昊申. 小河西文化生业模式初探[J]. 农业考古, 2021(1): 17-24.

- [6] 陈国庆. 兴隆洼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探讨[G]//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 第3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9–22.
- [7] 杨虎, 林秀贞. 试论兴隆洼文化小河西类型[G]//考古杂志社. 考古学集刊: 第18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23.
- [8] 杨虎, 林秀贞. 内蒙古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房址和墓葬综述[J]. 北方文物, 2009(2): 7–12.
- [9] 杨虎, 林秀贞. 内蒙古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出土遗物综述[J]. 北方文物, 2009(2): 13–21.
- [10] 索秀芬, 郭治中. 白音长汗遗址小河西文化遗存[G]//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 第3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301–310.
- [11] 王立新. 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J]. 考古学报, 2018(2): 141–164.
- [12] 李新伟. 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98.
- [13] 李新伟. 我国史前有槽箭杆整直器[J]. 考古, 2009(6): 62–71.
- [1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查海: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676.
- [15] 熊增珑.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0.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敖汉赵宝沟: 新石器时代聚落[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203.
- [17] 陈伟驹. 小河西和兴隆洼文化的绝对年代[G]//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 第26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53–62.
- [18] 闫欣, 党郁, 徐婷婷, 等. 内蒙古敖汉旗西刘家屯遗址碳十四年代研究[J]. 南方文物, 2025(3): 82–90.
- [19] 陈伟驹. 从西刘家屯遗址新发现再论小河西和兴隆洼文化的年代问题[N]. 中国文物报, 2025–08–16(5).

## The recognition of the “Xiaohexi culture” at the Yushushan and Xiliang sites in Aohan Banner

LI Tengda<sup>1</sup>, CHEN Weiju<sup>2</sup>

1. College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Since their initial excavation, the Yushushan and Xiliang sites in Aohan Banner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belonging to the Xiaohexi culture. The primary basis for this attribution was the restoration of three sandy reddish-brown cylindrical jars, regarded as typical artifacts of the Xiaohexi culture. However, the relatively limited number of unearthed remains—especially restorable pottery specimens—and the absence of a diagnostic assemblage of typical artifacts have directly hindered a definitive assessment of the cultural affiliation of these site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published material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from both sites, combined with references to their absolute date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Yushushan and Xiliang sit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of other sites clearly attributable to the Xiaohexi culture. Instead, they show closer affinities to the Zhaobaogou culture, while also possibly containing a small number of late Xinglongwa cultural remains.

**Keywords** Yushushan and Xiliang sites; Xiaohexi culture; Zhaobaogou culture; cultural attribution